

印度的中文教育：综述与评估

余德烁 段维彤 胡 阳

摘要：在印度的大学和教育机构里开展中文教育已有大约100多年的历史，但至今仍没有学者系统地对印度的中文教学进行过综合的介绍。虽然有一些学者曾经关注过印度中文教育的问题、挑战等，但是很少有人具体地关注中文学习机构的发展现状。一些学者也曾叙述过印度大学中的中文教学与研究，但是很少涉及印度私立机构和省级高校中的中文教学。对印度中文语言学习机构的发展，以及泰戈尔和谭云山先生如何互相协作建立里程碑式的中文学习机构——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对泰戈尔和谭云山共同事业的使命、目标和梦想，以及谭中先生如何继承父亲的事业进行探讨，意义重大。谭中先生已经90岁高龄，被公认为印度中文研究的元老，在过去的75年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印度中文学者。近年来，一些新兴大学开始提供全日制和继续教育的中文课程，教授中文的大型和小型机构都开始兴起。在印度学习中文的主要瓶颈，一方面是基础的教学资料不足，另一方面是缺乏专业的中文教师。

关键词：印度中文教育；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谭云山；谭中；中国学院

收稿日期：2020-03-27

作者简介：余德烁（Yukteshwar Kumar）（1970~），英国巴斯大学教授、博导，主要研究领域：汉语教学、中印关系；段维彤（1972~），天津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副教授；胡阳（1971~），天津商业大学会计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中印文化交流。

基金项目：本文为兰州大学印度研究中心项目“新时期中印关系的发展局势研究”（项目编号：2019jbkyjd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引言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两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接近2000年的时间里有持续的、双向的来往，实属世界罕见。在两国互相交往过程中，双方都希望能够很好地理解对方国家，其中宗教和贸易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佛教在中印两个国家的紧密交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两国佛教僧侣和学

者定期的、经常的互相访问持续了近10个世纪。在这持续上千年的时间里，他们还把佛教的经文从巴利文、梵文和其他的印度语言翻译成中文。由于有了佛教和贸易，一直到公元10世纪，中印两个国家的民众（特别是学者和僧侣）都非常热衷于了解对方国家。

在西方，大多数人认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是摩洛哥的卡鲁因大学（University of al-Qarawiyyin，建于859年），欧洲最古老的大学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à di Bologna，建于1088年），这两所世界闻名的大学一直持续办学至今。据考证，在这两所大学之前也有一些大学，如印度的那烂陀大学（Nalanda University，建于5世纪）和塔克西拉大学（Takshila University，建于3世纪）^①，中国著名僧人玄奘在7世纪早期就曾在那烂陀大学学习梵文和佛教经典，也曾在此教学。几百名学者和僧侣在中印两个国家之间互访，充分体现了两个国家的人民非常想了解对方国家，并且非常热情地学习对方国家语言的愿望。例如中国高僧法显、玄奘和义净，就曾系统地学习了梵文和印度其他语言，印度僧人鸠摩罗什（Kumarajiva, 334~413年）、菩提达摩（Bodhidharma, 483~540年）等也学习了中文。

10世纪之后印度的佛教逐渐衰落，印度后来成了英国的殖民地，而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印两国的交往开始逐渐减少，但在反抗殖民统治方面交往密切，两国独立后，就产生了新的想要了解对方国家的动机。

一个人要了解自己的祖国，他的动机可能是要了解祖国的过去，以及当前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但一个人如果要学习、研究其他国家，就会有其他动机。

具体到当代印度人的中国研究和中文学习，其动机可能来自这些方面：包括佛教的联系、贸易、对邻国的了解、处理两国边界纠纷、竞争、两国的友好关系以及保持地区平衡的经济合作等。那么，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双方的文明和文化，是泰戈尔想要在他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成立一个中国研究中心的主要原因。尽管大多数在印度的中文学习机构建立于印度独立之后，甚至是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之后，但有一些机构在20世纪初就建立了。本文将对当代印度的中文学习机构进行综述与评估。

二、当代印度的第一家中文学习机构

20世纪初，印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而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两

^① 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塔克西拉大学不是综合性的大学。

个国家都希望能够帮助对方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主义者的奴役。尽管处于恶劣的战争环境，这两个国家的学者都对进一步了解对方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有着浓厚的兴趣，两国的部分著名学者都访问过对方国家。在戊戌变法和百日维新失败之后，中国清末著名学者康有为从中国逃往印度的大吉岭，在那里躲避了一段时间。其他学者如梁启超，他虽然没有访问印度，但对印度始终抱有同情，并且热切地邀请印度学者和知识分子访问中国。经过长时间的热情邀请，这些中国学者说服了泰戈尔在1924年访华。在两国佛教交往中断之后，中国和印度都希望恢复它们之间的联系，因此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建立研究中心，用来研究、学习对方国家的语言文化和其他领域的知识。

在这一背景下，1918年印度第一家学习中文的机构在加尔各答大学成立。加尔各答大学、孟买大学和马德拉斯大学是印度最早的三所大学，都成立于1857年。这三所大学之前有一个塞兰布尔学院（Serampore College），1818年成立于西孟加拉邦。同时还有一个技术学院，即位于印度北阿坎德邦（Uttarakhand State）的鲁尔基学院（Roorkee University）。加尔各答大学的中文学习机构并非是一个成熟的院系，它没有提供相应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加尔各答大学历史系对研究生开设了一门名为“中国语言与文化”的课程，帮助研究生增加对东亚和中国语言、文化和历史的认知。加尔各答大学的管理层，特别是副校长——著名学者穆克吉教授（Ashutosh Mukherjee, 1864~1924年），热心于开设中文和中国文化的课程，并高度评价这门课程的重要性。尽管学习中文的需求和热情很高，但在当时开设这样的课程并非易事，因为当时没有受过很好的中文训练的印度教师。必须要指出的问题是：这一时期虽然中印之间来往密切，但没有印度人受过系统的训练，能够有专业的知识和足够的经验在印度的大学里教授中文。当时印度的大学里也没有同时精通英文和印度语言的中国老师，也没有这样的中国教授愿意利用假期来印度的大学授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加尔各答大学决定培养学者师觉月（Prabodh Chandra Bagchi, 1898~1956年），他对中文、东亚文化和历史有很深的兴趣，被认为是20世纪最著名的印度汉学家。在以全校名列前茅的成绩研究生毕业之后，师觉月很快被大学聘请为讲师。虽然师觉月精通印度历史、佛教和中印文化，但他当时连最基本的中文也不懂，在副校长的帮助下，师觉月联系了日本的木村教授（Prof. Kimura）和法国学者列维教授（Prof. Sylvain Levi, 1863~1935年）学习中文。师觉月后来来到法国学习并从事中印文化的研究。他也曾向法国汉学家马伯乐教授（Prof. Henri Maspero, 1883~1945年）学习中文，并进行联合研究。师觉月教授在加尔各答大学工作到1945年，后加入印度国际大学。为了进一步加强印度和中国的联系，当时的印度政府与北京大学

合作开展了派遣印度访问学者的项目，师觉月被挑选为第一个去中国讲学的印度教授，在中国从事了两年的教学与研究，他在北京的居所成为当时中印研究“交流中心”。回国后，他继续在国际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1954年担任副校长直至1956年逝世。他撰写了多部著作和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1944年出版的《印度与中国：千年文化交流》，该书内容虽然简单，但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后被中国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教授季羨林和金克木翻译成中文。师觉月精通中文、法文、巴利文、梵文、孟加拉语、印地语和英文等多种语言，除英文作品之外，他也发表了不少法文作品。

由于缺乏教师且当时的环境并不完善，加尔各答大学的中文项目在几年之后就暂停了，之后的很多年都没有中文教学的项目，直到最近才计划重新启动中文学位教育。

三、印度最著名的中文学习机构

尽管加尔各答大学是印度最早开展中文教育的高校，但由于缺乏足够的教师和学生，它最终没有成为印度最著名的中文学习机构。在印度最著名的、最富有开拓精神的中文教育机构是1937年4月创立的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Cheena-Bhavana, Visva-Bharati）。印度国际大学创立于1921年，但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863年由泰戈尔的父亲戴拍拿特（Maharishi Debenedranath Tagore, 1817 ~ 1905年）创立的学园。1901年初，学园被改造成为一个互助教育学校，当时仅有5名学生。在国际大学，尽管1937年才成立中国学院，但中文课程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泰戈尔热爱中国，20多岁就写了《死亡的贸易》。在这篇文章中，他批评英国帝国主义，将鸦片贸易称为一种纯粹的死亡贸易，这种贸易不会给中国人民带来任何利益，他批判英国在中国倾销鸦片，毒害中国人民；同时也批评日本帝国主义，并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运动。泰戈尔一直想在他新创办的学校里开设中文教学、开展中国和佛教研究，因此他在1920 ~ 1921年访问巴黎期间^①邀请了著名的法国汉学家列维教授。列维教授及妻子在国际大学工作了约两年，除讲授中文外，还教授藏语和法语。列维离开国际大学之后，泰戈尔在缅甸结识了缅甸华人学者林我博博士（Dr. Nin Ngo-Chiang），并邀请其到国际大学教授中文。林博士1924年来到印度，讲授中文和中国文化。^②顾凯杰先生（Vasudev Gokhale）是跟随林博士学中文的学生，他回忆说：“在中国的红纸上写中国书法很有意思，

^① “Sylvain Levi”, <http://www.visvabharati.ac.in/SylvainLevi.html>.

^② Vasudev Gokhale, “‘Early Sinological Studies at Santiniekta’ in Rabindranath Tagore, A Centenary Volume”, Sahitya Academy, 1961.

他们在教室和艺术学院都书写这样的书法作品，并把这些书法作品陈列在图书馆中。”^①在掌握了1000多个汉字后，这些聪慧的学生开始学习如诗歌和小说一类的中文的经典。

与列维教授一样，林博士也在国际大学教授了两年的中文。他离开后，意大利著名东方学家吉塞普·图奇教授（Prof. Guiseppe Tucci）作为访问学者加入了国际大学，教授中文，但他也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离开了。因此，泰戈尔对当时国际大学的中文师资安排并不满意，他很想在国际大学建立一个完善、成熟的中文与中国研究院系。1927年，泰戈尔访问新加坡，遇到了谭云山教授，他的梦想终于有机会成为现实。谭云山当时有去法国留学的愿望，但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对印度和印度文明非常向往。于是，泰戈尔邀请他来国际大学工作，开展中文教学和中国文化的研究。这对他更加有吸引力，他当即应允。1927~1937年，谭云山几次往返于印度和中国之间，1933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印学会，1934年在国际大学成立了中印学会印度分会（又称为中印文化协会）。蔡元培（1868~1940年）当选为第一任学会负责人，谭云山任秘书。泰戈尔当选为印度的中印学会第一任负责人，他的儿子小泰戈尔任学会秘书。中印学会主要目标有九个：^②一是组织印度文化代表团和中国文化代表团互访；二是组织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的代表团分别在对方国家讲授文化课程；三是推荐印度和中国学生赴对方国家学习对方文化；四是在中国建立一个中印研究机构或者是印度研究机构，印度和中国的师生能够在这个机构里学习，如果目前中印学会现在不能建立一个独立机构的话，这个机构应该协助在某些著名的中国高等院校建立一个独立的机构；五是在印度建立一个印中文化机构或者是中国学院，能够让印度和中国的师生在这里学习，中印学会考虑首先在印度国际大学建立这个机构；六是出版图书和期刊来发表印度和中国文化的研究成果，并且弘扬中印文化的精神以及相应的内容；七是在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都成立中印出版社，来出版和发行印度和中国的图书；八是在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之间都建立博物馆和图书馆，这个博物馆和图书馆首先在中印学会或者中国学院的范围内有着较小的规模，将来会逐渐发展和扩张，成为独立的博物馆和图书馆；九是中印互派访问学者，并且给这些学者提供帮助和住宿。

谭云山是当代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最有才能、最勤勉的组织者，他和许多中印两国的领导人、政治家 and 企业家都有着良好的关系。谭云山教授认识多位印度和中国的领导人和政治家，包括甘地、尼赫鲁、蒋介石、蔡元培、戴季陶、毛泽

^① Ibid., p407.

^② Tan Chung, ed., *In the Footsteps of Xuanzang: Tan Yun-Shan and India*, New Delhi: Gyan Publications, 1999.

东和周恩来等。他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且能够为中印学会募集巨额资金和寻找多种资源，致力于筹备中国学院。1936年他再一次从中国返回印度，当时他带来了50000印度卢比的捐款（当时50000印度卢比大约相当于800美元，相当于现在几百万印度卢比的价值），并且还带来了中国各界人民和社团捐赠的100000本图书。泰戈尔很高兴地把位于国际大学中央的一片土地划拨给谭云山，用来建造中国学院，这就是中印学会目标里提到的印中文化机构。谭云山制定了建筑计划，印度当地的著名建筑师苏伦·卡尔（Surendranath Kar, 1892 ~ 1970年）帮助他设计了建筑规划蓝图，苏伦·卡尔先生是当时中国学院的主要建筑承包商。

1937年4月14日，正值孟加拉新年，中国学院（Cheena-Bhavana）举行了落成典礼。中国学院的墙壁被当时印度杰出的艺术家南达拉·鲍斯（Nandalal Bose, 1882 ~ 1966年）和比诺德·比哈里·穆克吉（Binode Behari Mukherjee, 1904 ~ 1980年）装饰得很漂亮，当时中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1868 ~ 1943年）书写了“中国学院”的匾额，挂在了学院的正门，戴季陶也向中国学院赠送了个人的书法作品，现在人们在中国学院后面的建筑里仍然能够看到这些作品。甘地和尼赫鲁受邀参加开幕典礼，但由于甘地临时有紧急事务，尼赫鲁患病，均未能到场出席，但都发来了贺词。甘地在给泰戈尔的贺词中说：希望中国学院成为连接中国和印度交往的象征。尼赫鲁派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 1917 ~ 1984年，后来成为印度的总理）代表他和众多不同阶层的印度人民出席开幕庆典。在开幕庆典上，泰戈尔发表了长篇的富有激情的讲话。

“这是大喜的吉日，我盼望已久。我现在可以代表我的同胞把我们过去暗中的诺言付诸实践，承诺维持我们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友好相处。早在18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以无限的艰忍与牺牲为这一交流奠基。许多年前我去到中国，亲身体验到：从印度的心脏地带跨越雪山与沙漠而蔓延到远方的那股生命的洪流，使得那儿的人们的心田受到灌溉与滋润。我憧憬着那伟大的朝圣时代，那些高尚的英哲，为了信仰，为了解脱的理想，发展出对万物的十全十美的爱心，舍生忘死，离乡背井，自我流放，抛弃红尘。许多人踪影全无地消失。少数人幸存，他们的事迹传播开来——不是那种探险与侵略者为永无止境的强盗行为赢得浪漫合理性的英雄事迹，而是奉献出爱心与智慧的礼物而赢得他们的东道主在文化上永远铭记的朝圣故事。当我成为可敬民族的代表而受到（中国人民）欢迎之时，也正是我听到这些故事而为我们（印度）前辈遗留的荣耀感到自豪，我也踏着他们留下的深深脚印而游历了（中国）各地。另一方面，我却感到羞愧，我们（印度）遭受长久的厄运，我们在岁月的蹉跎中丧失了高尚事业的人类历史上最

宝贵的伟大价值。”^①

在谭云山教授的精心设计、密切的监督之下，中国学院建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和图书馆，谭云山教授说他希望这个建筑在1000年后都能挺立在世间。他的希望后来确实成为现实，在国际大学大多数其他建筑已经达到腐烂程度之时，中国学院仍然巍然屹立，并且迎接了全世界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几十位领导人来到学院访问。

谭云山教授1928年第一次来到印度，到达国际大学之后就开始了中文教学。开始只有5个学生——普拉巴特·穆克吉（Prabhat Kumar Mukerjee, 1892~1985年）、贝诺（F. Benot）、苏吉特·穆克吉（Sujit Mukherjee）、乔杜里（Dr. A. Chowdhury）和帕特先生（Mr. Pate）^②。谭云山教授也写作和发表了一些关于印度的文章，这些文章在中国上海发表。

中国学院揭幕典礼之后，谭云山就被任命为学院的第一任院长，考虑到学院当时紧张的财政状况，他没有从印度政府那里获得一分报酬，他每个月的工资都由中国政府或者是中国和印度的热心人士捐助提供。学者普遍承认如下事实：谭云山先生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具有博大的奉献精神以及对中印两国的热爱，他在没有拿到中印两国持续稳定酬金的情况下，为中印友谊做出了巨大贡献，能够为促进两个国家的友好关系尽力，受到中印两国人民的普遍赞扬。印度的慈善家比拉集团（Birla Group）和塔塔集团（Tata Group）继续支持泰戈尔和谭云山的理想，塔塔集团至今仍在为国际大学的宾馆提供捐助，同样，比拉集团也捐助了5000卢比来开展一些研究项目，并承诺在将来会继续捐助。谭云山教授在此后继续访问了印度的多所大学和学院，并且发表演讲激发这些高校师生的兴趣，介绍中国的哲学、宗教、社会和政治相关知识给这些学生。

在中国学院开办的早期，除了谭云山教授之外，巴塔查里亚·沙斯特里教授（Prof. Vidhushekhar Bhattacharya Shastri）是主要研究者，成为中国学院的研究主任。在谭云山暂时离开中国学院时，巴塔查里亚·沙斯特里教授就代他管理学院。尽管巴塔查里亚·沙斯特里教授中文并不完美，但是他能够很好地了解中国文化与文明。其实根据中国学院的早期规划，巴塔查里亚·沙斯特里教授和其他精通佛教和梵文的学者本来应该被派往中国，并且在中国教授梵文和佛教，同时一些著名的中国学者（例如梁启超）应该被邀请来教授中文和中国文化，以及进行其他关于梵文的进一步研究。有些文献曾经记载过，梁启超在1924年答应了来

^① 谭中，郁龙余编著：《谭云山》，中印研究丛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56-57页。

^② Tan Chung, Tan Lee, eds., *In the Footsteps of Xuanzang: Tan Yun-Shan and India*, New Delhi: Gyan Publications, 1999.

国际大学进行教学和研究，但是由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当时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都不是很好，梁启超没有能够实现他的承诺。

除了巴塔查里亚·沙斯特里教授之外，其他几个印度和外国的学者也加入了中国学院，包括戈卡莱博士（Dr. Vasudev Gokhale）、苏吉特·穆克吉（Sujit Mukherjee）、巴宙、苏门加拉女士（Rev. Sumngala）、施淑露、萨斯特里（Aiyasswami Sastri）和其他一些从中国来的兼职学者，^①一些在中国学院接受培训的学者后来成为印度甚至国外的高校教师，他们讲授中文和进行汉学研究。

中国学院不仅在当时成为从事中国语言与文化教学和研究的场所，并且成为一个通道：通过这个通道，中国著名学者和外国学者受邀访问印度，并且印度学者和政治家受邀访问中国。中国著名画家徐悲鸿曾经访问过中国学院，他于1939年作为访问学者在中国学院待了一年。徐悲鸿在见到了泰戈尔之后，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灵感启发并创作了很多标志性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在印度展出，并且被许多国家保存和展出。

徐悲鸿之后，多位中国名人，例如中国佛教高僧太虚，以及当时的中国官员戴季陶于1940年在谭云山的邀请之下访问了国际大学。在谭云山的多次劝说下，印度国大党主席尼赫鲁在1939年对中国进行了两个星期的访问，从中国朋友那里获得了对印度谋求独立的支持。谭云山也为印度援华医疗队做出过贡献，1938年印度派遣5名医生组成的医疗队来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中国士兵提供医疗服务。他还给这五位医生都起了中文名字，其中包括著名的印度医生 Dwarkanath Kotnis（1910~1942年），即后来家喻户晓的柯棣华大夫。

在1941年，北京大学学者吴晓玲加入国际大学，从事佛教研究，她还给印度学生教授标准的普通话。泰戈尔的外甥，阿米滕德拉纳（Amitendranath Tagore）教授是中国学院最初的五名学生之一。他在一次记者的采访中回忆他跟随吴晓玲教授在尼赫鲁大学学习中文的往事。^②阿米滕德拉纳教授回忆，在刚开始的时候，学生们能够获得每月30卢比的奖学金来学习中文，这笔奖学金是当时中国的领导人为了中印友好而拨款的。在那些日子里，中文的古代经典教材和当代教材都有机会学习，并且对于感兴趣的同学来讲，学习的任务是比较繁重的。在1946年印度获得独立之前，一部分印度学生（大约七八名）从中国学院被派往北京大学去学习中文，他们是由政府奖学金资助的。这些第一批去北京大学的学者包括了阿米滕德拉纳（Amitendranath Tagore，后来在美国教书、研究中国文学）、沙

^① Tan Chung, Das Gupta, Uma, eds., *Sino-Indian Studies at Visva-Bharati University, Tagore and China*,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011.

^② “Interview with Prof. A. N. Tagore”, <http://politics.ntu.edu.tw/raec2/act/india07.doc>.

蒂兰詹·森 (Shatiranjan Sen)、阿帕斯瓦米 (Jaya Appaswamy)、尼哈尔·巴布 (Nihar Babu)、文卡塔拉曼 (S. Venkataramanan; 后来任中国学院院长) 和白春辉大使 (Vasant Vasudeo Pranjpe^①)。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人回到印度之后成为印度国际大学的教职员工, 其中白春辉被当时印度的外交部聘用, 并且后来成为驻韩国大使, 也担任过驻其他国家的印度大使, 在尼赫鲁会见中国领导人的时候负责翻译。

在谭云山的推动之下, 中国学者金克木在1941年来到中国学院进行教学和研究, 并且在印度待了4年。蒋介石和他的夫人也访问了中国学院, 并且捐款50000卢比。

其他曾经来中国学院访问的学者还包括法舫、巫白慧、徐志摩、陶行知、张大千、常任侠、徐梵澄、丁西林和魏瑰荪教授等。^②

1957年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印度国际大学获得了荣誉学位, 他还亲自访问了中国学院。由于有了中国和印度政府领导人的支持, 中国学院在谭云山的领导之下成果丰硕, 并且在中国学院培养了一批印度顶尖的汉学家。在1983年谭云山逝世之后, 中国学院逐渐衰落。尽管中国学院仍然提供中文的本科和研究生学位, 从国际视野来讲, 现在它并没有巨大的影响力。中国学院长期以来没有中文实验室来学习正确的中文发音, 直到最近中国学院才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一笔大额的捐助, 中国学院有望建立一个数字语言实验室。

谭云山也曾试图在鹿野苑 (鹿野苑是佛教的宗教圣地, 被认为是释迦牟尼最终成佛的地方) 建立一个院系, 但是这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

四、1947~2020 年印度中文学习机构的发展

在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的头一个十年, 印度和中国充满了兄弟般的情谊, 但是在这段时间内, 并没有新的中文学习机构建立。在1962年中国和印度爆发中印边境冲突之后, 形势发生了变化, 边境冲突之后却成立了几个中文学习的高校院系和机构。

(一) 德里大学的东亚研究系

为了更好地学习和研究中国的语言与文化, 作为印度战略的一部分, 德里大学在1964年建立了中文研究中心, 第二年, 中文研究中心在杜塔教授 (Prof.

^① Vasant Vasudeo Pranjpe was very known to the first author of this paper. He used to go to his house regularly in Delhi before his unfortunate demise on 8 April 2010.

^② 赵守辉:《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汉学研究与汉语教学》,《世界汉语教学》,1996年第1期,第106~107页。

Vidya Prakash Dutt, 1925 ~ 2011年)的支持下成为一个成熟的院系。1971年他被选为印度上议院议员。1969年随着日本在国际舞台的兴起和重要性增强,该院系增加了一些日语和日本文化研究的项目,随着韩国在接下来的一些年份里经济实力增强,在2000年的时候增加了韩国研究项目,因此,该系的名称更改为现在的“东亚研究系”。尽管这个系是印度最重要的中文研究院系,但是至今它还没有中文学士学位与硕士学位。2006年,这个系试图开设中文硕士学位学习计划,并且该学校学术委员会已经批准了这个计划。但是由于缺乏合格的教师还有其他不清楚的原因,这个系的中文硕士项目现在还没有开启。这个系现在已经拥有了一些中文学习项目,能够授予证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个院系已经培养出多名著名的中文语言学家和双语学者。著名的印度汉学家谭中教授在1960年加入了这个系,并且他的妻子黄绮淑也在这个系工作,直到1998年退休。与其他高校的中文院系不同,这个系拥有自己的图书馆,有超过60000卷图书,并且拥有大量的东亚语言文化研究期刊。这个系的一些著名学者现在已经退休了,还有一些已经与世长辞了,如德辛卡教授(Prof. GiriDattatreya Deshingkar, 1932 ~ 2000年),米拉·辛哈·巴塔查尔吉教授(Prof. Mira Sinha Bhattacharya, 1939 ~ 2009年)。东亚研究系的学者成立了中国研究所,并创办刊物《中国述评》,至今已有56年。中国研究所作为智库,不仅从事语言学的研究,还开展中国问题研究,组织一些中国语言方面的论坛以及其他相关方面的论坛。

(二) 贝拿勒斯大学的外语系

谭云山与其友人计划在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开设一个与中国学院类似的中文研究院,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困难和财政约束,这个愿望始终未能实现。贝拿勒斯大学(BHU)是继加尔各答大学和印度国际大学之后,最先在校园里开展中文研究项目的大学。中文项目1961年开始实施,项目设在外语系之下,针对本科和研究生开设普通证书和学位证书课程。中文研究院开办之初就保持邀请国外访问学者的传统,并且总是有一名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贝拿勒斯大学外语系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语言与文学、中印交往。该系的卡马尔希尔(Kamalsheel)教授取得了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的博士学位,从1984年开始在外语系授课,后担任人文学院院长。加入贝拿勒斯大学之前,卡马尔希尔教授曾在旁遮普大学(Punjab University)执教多年。贝拿勒斯大学成立于1916年,它的创建者是著名的印度学者潘迪特·马丹·莫汉·马拉维亚(Pandit Madan Mohan Malaviya, 1861 ~ 1946年),他在1914年12月获得了印度最高的国内奖项——国宝勋章(Bharat Ratna)。

（三）新德里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

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and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 CCSEAS）是印度现在最著名的中文学习机构，随着印度国际大学中文学院的衰落，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变得越发有名望，也因此获得了许多现代化的设备资助。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设在外语学院的语言、文学和文化研究学院，语言、文学和文化研究学院创立于1969年，是尼赫鲁大学建校时的第一批院系，也是印度中文教学与研究的中心之一，像谭中教授和雷博士（Dr. Haraprasad Ray, 1931~2019年）都曾在这里担任过教职。在雷博士和莎兰女士（Vimala Sharan, 1936~1994年）的帮助下，来自中国香港的胡继草和翟韩胜（音译）在该中心创立了中文学习项目。这个中文学习项目最初隶属于亚洲与非洲语言中心（Center for African and Asian Languages, CAAL），进行语言教学。这个中心能够授予中文、日文、韩文、波斯文和阿拉伯语的学士学位与硕士学位。自从创立以来，每一种语言都各自得到了发展，并且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相应的系。

中国学院首任院长谭云山的长子、著名学者谭中教授在1976年加入了这个中心，直到1994年退休。谭中教授为语言、文学和文化研究学院做出了重要贡献，不仅对尼赫鲁大学，而且对印度整个国家的中文学习都有着极为重要的贡献。尼赫鲁大学从初建时就拥有设备良好的语言实验室，这些设备不仅能够使学生更好地学习外语，并且能够学到更纯正的外语知识，因此该研究中心在20世纪70年代培养了一批杰出的、精通中印双语的专家、语言学者、笔译和口译人员。该研究中心其他著名教师包括叶书君教授（Yap Rahman），他是来自新加坡的华人。该研究中心经常有中国的访问学者讲学，他们一般会在这里教学一到两年，然后返回中国。在派遣印度留学生赴中国大陆或者中国台湾学习高级中文课程方面，该研究中心在印度具有权威地位，这些学生能够享受印度和中国政府的奖学金。

（四）印度政府国防部外语学校

在印度独立之后不久，国防部管辖之下的国防部外语学校（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FL）于1948年在新德里成立。自成立之后，该学校提供包括中文在内的18种外语课程，并且具有培训证书和学位证书的授予权。考虑到在军队中讲授和学习外语的重要性，印度政府在1954年给予这个学校永久教育机构的地位。虽然对于印度军队来说，这个学校无疑是学习中国文学和文化最好的机构，但是这个学校也能够满足其他印度政府部门学习外语的需要，并且来自民间的学生也可以来听课。这个学校没有本科和研究生级别的项目，但是它会授予语言熟练程度证书和语言熟练程度高级文凭。该校同时开设了全日制课程和业余课程，并且该校拥有大量的图书杂志和音频视频等中文学习资料。

（五）位于中央邦五山库的军队教育与训练学院（Pachmarhi, Madhya Pradesh）

1947年6月1日在中央邦五山库成立的军队教育中心（Army Education Core, AEC），是面向军队人员的全日住宿制教育机构。在中印边境冲突之后，印度政府下决心要让印度军人更好地掌握中文语言与文化知识，因此这个学校在1963年开办了中文学习项目。但是与新德里的外语学校不同，民间学生是不能在这里听课的。这个教育机构有很好的语言实验室，并且拥有充足的音频视频训练资料。

（六）位于浦那的国防学院（National Defense Academy, NDA）

建立于1954年的印度国防学院是全世界第一家三军学院（包括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军校），这个学院主要培养陆海空军官，让这些军官在履职之前受到相应的培训。该校初建时就提供了中文课程，著名的汉学家谭中教授曾经在此授课。该校所有军队学员都必须有一门必修课，就是学习一种外语，学生可以在阿拉伯语、中文、俄语和法语中选择一种来学习。

（七）旁遮普大学（University of Panjab）

旁遮普大学在1964年建立了中文与藏文语言系。该系最初的名称是中亚研究系，在2003年更名为中文与藏文语言系，现在该系能够提供中文与藏文的高级学位教育。除此之外，这个系还提供中文与藏文研究的指导。现在贝拿勒斯大学工作的卡马尔希尔教授，曾经在1982年到1992年之间在旁遮普大学的中文与藏文语言系工作过。

（八）拥有小规模中文院系的其他大学

在印度其他的一些大学，有几个大学也开办过中文的证书与学位教育，其中一些大学仍然在持续地开展这些项目，一些学校由于缺少学生、师资和基础设施，就不再开展中文项目了。有一些印度著名大学曾经开设过中文项目，但是现在已经停办了，这其中包括阿拉哈巴德大学（Allahabad University），勒克瑙大学（Lucknow University）和戈勒克布尔大学（Gorakhpur University）。有一些大学仍然在持续地开展中文项目，这些大学包括潘扎比大学（Punjabi University, Patiala），西孟邦卡丽安妮大学（Kalyani University, West Bengal），乌特卡尔大学（Utkal University, Bhubaneswar）和马拉特瓦达大学（Dr. Babasheb Ambedkar Marathwada University, Aurangabad）。

五、21 世纪逐渐兴起的中文学习机构

进入21世纪，印度政府和印度民众开始意识到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的重要性，因此有好几所大学和机构开始提供中文课程。也有一些大学提供业余课

程，有些只提供证书、学历、高级学历课程，这些学校中的一部分甚至提供本科和研究生水平的课程。

已经开始提供中文教育证书与文凭的高校包括：新德里泽米亚大学（Jamia Millia Islamia University, New Delhi）、提斯浦尔大学（Tezpur University, Tezpur）、阿萨姆邦迪布鲁格尔大学（Dibrugarh University, Assam）、西孟加拉邦柏德旺大学（Burdwan University, West Bengal）、印度瓦尔德哈圣雄甘地大学（Mahatma Gandhi Antarrashtriya Hindi University, Wardha）和海德拉巴英语和外语大学（The English and Foreign Language University, Hyderabad）。

考虑到学习中文需求的日益增长，有几所印度高校开始提供本科和研究生水平的课程，其中包括锡金大学（Sikkim University）、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Aligarh Muslim University）、杜恩大学（Doon University, Dehradun）、哈肯德邦中央大学（Jharkhand University, Ranchi）、位于金奈的IIT马德拉斯中国学研究中心、韦洛尔科技大学（Vellor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VIT）下属的中国语言中心，古吉拉特邦中央大学（Central University of Gujarat）。

六、私立中文学习机构的兴起

随着中国和印度之间商业贸易、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往来的日益密切，在印度想学习中文的人的数量在不断增加。1994年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额仅为10亿美元，2015年超过了75亿美元。预计在几年之后，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将达到100亿美元。在2000年以前，很少有从事经贸工作的印度人学习中文，但是在近几年，为了更好地开展经贸活动，能够直接与中方的合作伙伴对话，越来越多的印度商人选择学习中文。

印度也是在软件行业领先的国家，有几个私营的软件公司发现，为了能够更好地打开中国市场，他们的雇员应该学习中文。这些软件类的专业人士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到一个著名的大学来上全日制的课程，因此，他们会选择到私立机构去上业余或周末的中文课程。

根据商业服务机构Justdial.com的在线企业目录，在孟买有25个私立机构在讲授中文普通话，在新德里及其郊区则多达120个。^①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字与在中国学习印地语或其他印度语言的情况相比，人们不难发现，在中国甚至没有一家私立机构教授这些语言。

几所私立的高校发展迅速，在印度有几个主要提供商业管理和工程课程的高

^① PawhaJetley, Neeraj, “Why Indians Have No Choice but to Learn Chinese”, <http://www.cnbc.com/id/100760184>.

校也开始意识到学习和教授中文的重要性，一些著名的私立高校现在均开始提供中文课程。位于哈里亚纳邦的金达尔国际大学，获得了中国台湾教育部门的支持，2011年建立了中国台湾教育中心，提供全日制和业余的中文课程，聘请中国台湾的教师来教中文。在孟买的索麦亚佛教研究中心（Somaiya Vidyavihar），连续几年提供中文业余课程。在索麦亚先生（K. J. Somaiya）逝世之后，该中心停止了中文课程的讲授。阿米提大学外语学校（Amity University）在印度多个不同的城市和城镇都有校区，也提供全日制和业余的中文证书学历和高级学历课程。

在印度能够学习中文的著名私立机构包括：新德里的印度智慧学院（Bharatiya Vidya Bhavan，成立于1938年）和尼赫鲁语言学院、位于加尔各答的罗摩克里希那教会（Ramakrishna Mission）、普纳的西部地区语言中心、加尔各答的中文学校、班加罗尔的印度普通话学校、新德里的中文学院、昌迪加尔中文学习学院（Study Chinese, Chandigarh）、印度—中国工商总会（Ind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New Delhi）和古尔冈易语国际汉语教育（Yi Chinese, Gurugram）。

七、中文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外语专家的意见，印度在未来10年里每年将会需要至少5000名中文专家、口译师或笔译师。尽管印度的公立和私立教育机构付出了很多努力，每年也仅有大约1000名高校中文专业的学生能够获得相应的证书，因为考试的通过率大概只有50%。^①

在印度学习中文的主要问题是缺乏中国来的教师（以中文为母语的教师），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文主要由华人教师（或以中文为母语的教师）来讲授，仅有少部分当地的老师做补充。在印度，大多数教师是印度当地人，仅有小部分教师以中文为母语。另外一个常被忽视的挑战是：教师在给印度学生讲授中文时，往往是通过英语来讲授的，而不是通过印度学生的母语来讲授。如果这些学生的英语水平不高的话，他们就无法很好地学习中文。因此我们完全同意康静博士（Geeta Kochhar）的建议：在印度学习中文的主要瓶颈，一方面是基础的教学资料不足，一方面是缺乏中国老师。^②

缺乏语言实验室和相应的基础设施是另外一个瓶颈，绝大多数的（公立和私立）高校没有很好的数字语言实验室，因此学生们不能正确、精准地学习中文发

^① Antony Kuriakose, “Mandarin Chinese: why you must learn it”, *Deccan Herald*, 19 May, 2010.

^② Geeta Kochhar, “Teaching Chinese to Indian Students: An Understanding”, *Technology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June 2013, pp14~36.

音和中文语调。

与其他国家不同，在印度，中学和小学里并没有中文课程。印度政府曾经决定在一些中学里开设中文课程，但是2014年新上台的印度政府又取消了整个计划，仅仅强调学生应该努力学习印度的语言、文化和传统。尽管一些私立学校提供中文课程，但是这些学校的数量非常少。如果印度学生能在其学习生涯的早期阶段学习汉语，那将会很有利于中文教育的发展。

印度政府对孔子学院心存疑虑，所以很久以来没有批准在印度建立孔子学院。仅仅是在最近，孟买大学才被允许建立孔子学院。

八、结语

现在印度有超过5所高校有中文与中国文化研究系。近几年来，印度的中国语言与文化研究无疑得到了发展，越来越多的公立和私立学校现在开始提供中文课程，但是在印度中小学领域的中文教育仍然有大量工作需要做。

印度政府不仅应该关注缺乏合格中文教师的问题，还要提升印度各个高校语言基础设施与实验室的水平。私立高校和私立机构应该更注重中文课程的质量，而不应只关注开设新课程、吸引大量的学生和提高盈利。

[责任编辑：孙喜勤]